

“7至17世纪西藏历史与考古、宗教与艺术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张长虹

内容摘要:2013年7月13日至15日,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联合主办的“7至17世纪西藏历史与考古、宗教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霍巍教授和哈佛大学南亚系的范德康教授。来自美国、荷兰、瑞士、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和我国北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的汉藏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42篇,其中35篇论文的作者做了大会发言,围绕“吐蕃时期的考古、艺术与文献”、“西藏西部的历史、考古与艺术”、“藏传佛教文献与宗教研究”、“西夏、元明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西藏考古与艺术的新发现”、“藏文历史文献研究”等多个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会议的论文将在《藏学学刊》本辑和下辑陆续刊出。

2013年7月13日至15日,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联合主办的“7至17世纪西藏历史与考古、宗教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继2011年

* 本文的撰写得到四川大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SKQX201107)资助。

8月青藏高原史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¹之后第二次共同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此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霍巍教授和哈佛大学南亚系的范德康教授(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来自美国、荷兰、瑞士、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和我国北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的汉藏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42篇,其中35篇论文的作者做了大会发言。会议的论文将在《藏学学刊》本辑和下辑陆续刊出。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研讨期间,与会代表分别就“吐蕃时期的考古、艺术与文献”、“西藏西部的历史、考古与艺术”、“藏传佛教文献与宗教研究”、“西夏、元明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西藏考古与艺术的新发现”、“藏文历史文献研究”等多个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吐蕃时期的考古、艺术与文献

吐蕃时期考古与艺术的研究,由于卫藏地区考古材料与佛教美术遗存的相对匮乏,学者们往往将目光聚焦在吐蕃周边地区或吐蕃曾经占领过的地区,如川青藏交界的藏东地区和敦煌等地。近年来,关于藏东地区吐蕃时期的佛教摩崖石刻、青海发现的吐蕃时期的墓葬以及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石窟的研究成为吐蕃时期考古与艺术研究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和热点。

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张建林研究员对西藏、四川、青海等地发现的吐蕃时期的佛教造像遗迹进行了初步统计,总数已达20余处,造像的题材以大日如来为主,风格上可以看出印度、尼泊尔和汉地的影响,也有“吐蕃样式”的佛教造像。不仅如此,张建林研究员还通过对这些吐蕃时期佛教造像地域分布特点的分析,认为与传统的“唐蕃古道”并存,另外还有一条连接唐蕃之间的佛教传播路线,该线以青海玉树为节点,通过四川石渠,再至西藏江达、察雅、芒康等县,可以说是南通南诏、西通吐蕃腹地,北接丝绸之路²。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张长虹博士则对上述路线中的一个点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该点位于青海玉树的勒巴沟内,2012年夏天由四川

1 关于此次会议的情况参见杨锋:《跨界对话:青藏高原史前研究新进展》,《藏学学刊》第8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1-8;霍巍:《范式转变与路径突破:近年西藏史前史研究新趋势》,《历史研究》2013(3):134-144。

2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资料均来自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7-17世纪西藏历史与考古、宗教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摘要集》,2013年7月13-15日,成都。

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系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进行了考古调查。该点所在地小地名称为吾娜桑嘎（དབུས་ནག་སང་གཞི 意为“中央的佛像”），共发现有5组图文并茂的阴线刻佛教故事画面和古藏文题记，目前已经辨识出来的画面有猕猴献蜜、腋下诞生、降自三十三天、降伏外道和涅槃等故事场景，题记内容则有对猕猴献蜜和腋下诞生故事的简要描述、《无量寿经》、《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从造像的艺术风格和藏文题记的书写特点来看，初步可以判断其年代应该在吐蕃晚期。此处佛教摩崖石刻造像内容丰富，大大充实了吐蕃时期佛教美术考古的研究材料；岩面上刻写的大量藏文佛经，无独有偶，则均有对应汉文佛经文本的存在，这对于研究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西藏大藏经中除了收录了占多数的译自梵文的佛经，还收录有译自汉文的佛经。在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也表明有一些经典是由汉文译自藏文的，而这些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荷兰莱顿大学的斯尔克教授（Jonathan A. Silk）以《恒河上优婆夷会》和《阿弥陀经》为例，对同一文本的汉、藏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尤其是一些相同的术语在汉、藏译本中不完全相同的翻译，来考察佛经翻译背后对佛教思想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汉藏佛经文本对勘研究的典范。他同时还指出，对于汉译的佛教文献，西方学界往往重视不够，认为汉译本的表述不够精确、主观性强，不如能够与梵文语法和用词相互对应的藏译佛教文献精确，但是通过他对汉、藏佛教文献的对勘分析，他认为汉译的佛教文献同样精确呈现了印度的佛教思想，同时也能够被当时的受众正确理解，而对应的藏文译本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汉文佛经翻译的语言风格和特色。这种观点与中国学者近年来所倡导的汉藏佛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不谋而合³。

在敦煌的古藏文佛经写本中，常能在一些报废的经叶上发现一些奇怪的古藏文文字，它不符合古藏文的拼写规律，因此不知其表达的是何意。来自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华青道尔杰（张延清）博士通过检阅大量甘肃省藏敦煌古藏文文献和法藏古藏文文献，破译了这个长期未解的怪谜。原来这些古怪的藏文表示的是一套独特的数字编码，表示从1到460的数字，用于表示报废经叶抄写所据母本的编叶，后来因为有缺陷被停用。

对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石窟的研究是近年来藏学界和敦煌学界均十分关注的课题。来自敦煌研究院的沙武田研究员的论文《吐蕃对敦煌石窟影响再探——吐蕃因

3 沈卫荣：《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刍议》，《历史研究》2009（1）：51-63。

素影响下的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功德窟》以张议潮功德窟(敦煌莫高窟第156窟)为例,探讨了吐蕃政治势力退出敦煌之后,吐蕃因素仍然影响敦煌石窟的原因。他认为,在开凿位置上,156窟靠近吐蕃代表性窟158窟和159窟,与其正上方的161窟及其上的土塔形成典型的受吐蕃影响的窟、塔垂直组合形式;156窟的洞窟形制和壁画的经变题材均具有吐蕃窟的特点;壁画的艺术风格也表现出吐蕃波罗艺术风格的影响,北壁下方的出行图展示的是吐蕃舞蹈。这些吐蕃因素在该窟出现的原因是:张义潮起义推翻吐蕃统治之后,一些吐蕃人及后裔仍然生活在河西地区;张义潮本人成长于吐蕃统治时期,曾到吐蕃求学,熟悉吐蕃统治时期的佛教文化和艺术;张义潮在推翻吐蕃统治的过程中,曾得到吐蕃人的帮助,决定了他以后对吐蕃人的态度,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发现他抄写的多部藏文佛经也表明了他对吐蕃文化的态度;他的老师——吐蕃高僧法成有可能曾经参与了156窟的洞窟设计。

2002年,在青海省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夏塔图的两座墓葬中发现了两块完整的彩绘棺板,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来自西安工程大学艺术工程学院的马冬教授在他的发言《青海夏塔图彩棺〈性爱图〉粉本来源再议》中,引用四川新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野合图”作为证据,认为夏塔图木棺上的“野合图”的图像粉本可能是受到了东汉末四川“天师道”或所谓“五斗米道”、“新出正一盟威之道”的“男女合气”类图像的影响,提出应该考虑道教、特别是东汉末四川道教对青海西部地区的影响。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宋耀春先生曾参与夏塔图棺板画的临摹工作,他曾在工作过程中对画面内容进行了记录,他的论文公布了对棺板画中各类形像的数据统计,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

二、西藏的考古与艺术新发现

在西藏自治区进行的考古与艺术调查的新发现、新成果总是十分惹人注目。来自北京大学的萨尔吉博士曾经参与故宫博物院对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浪卡子县达隆寺的考察,此次会议他公布了达隆寺的壁画题记和主要的图像配置,并对寺中的龙自在王佛图像进行了探讨,认为龙自在王佛的出现可能与麻风病的治疗有关。山南地区乃东县的吐蕃古寺吉如拉康曾经发现了大量的古老写本,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据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数写本属于11世纪,亦有少数般若经写本可以归

于吐蕃时期⁴。来自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马休·凯普斯坦教授 (Matthew T. Kapstein) 一直很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和中国的考古新发现, 他提交的《对翁·吉如寺般若波罗蜜多经写本的初步考察》一文就分析了吉如拉康发现的一些般若经写本, 他认为一些般若波罗蜜多经写本从纸张、用墨和插图的艺术风格来看, 应该属于 12 世纪晚期。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近年来致力于古建筑的维修、考古调查和研究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 该所的李亚忠先生介绍了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古寺强准祖拉康的保护维修情况, 并分析了其建筑风格的来源。何伟女士则对西藏石窟寺的平面形制进行了探讨, 将西藏中部拉萨和山南地区、南部日喀则地区和西部阿里地区三个主要石窟寺分布区的大量石窟分为塔庙窟、佛殿窟、佛坛窟、僧房窟等几种形制。所长哈比布和罗布扎西先生虽未能参会, 但均提交了论文, 前者介绍了 2012 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陕西龙腾勘探有限公司联合对西藏林芝地区朗县列山基地的考古调查和测绘情况, 此次调查共发现各类遗迹现象 299 处, 其中墓葬 224 座、殉葬坑 38 坑、建筑基址 18 座、石碑座 1 座、加固墓葬封土的墙址 18 处, 基本上搞清了列山基地的分布范围、数量、墓葬封土形制及各类遗迹的相互关系, 为后续的保护规划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资料信息。后者则介绍了西藏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发现的一处摩崖造像——洛哇傍卡摩崖造像, 主要内容有佛像、佛塔和藏文题记, 年代大约为公元 9 至 11 世纪, 是西藏境内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早期佛教摩崖造像。

三、西部西藏的历史、考古与艺术

西部西藏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 是中亚、西亚和南亚文明的交汇地, 曾经是古老象雄文明的中心地带、本教的发祥地和上路弘法的肇兴地, 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历史上的西部西藏地区, 远远大于今天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这一行政区划概念, 包括有巴尔蒂斯坦 (Baltistan)、努布拉 (Nubra)、桑噶尔 (Zangskar)、拉合尔 (Lahul)、斯比提 (Spiti)、古格、阿里、普兰、噶纳里 (Karnali)、堆波 (Dolpo)

⁴ Pasang Wangdu, "Ke ru lha khang: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Central Tibet." In Deborah Klimberg-Salter, Kurt Tropper and Christian Jahoda, eds., *Text, Image and Song in Transdisciplinary Dialogue*. Brill's Tibetan Studies Library 10/7. Leiden/Boston: Brill, 2007: 45-61.

和牟塘 (Mustang) 等地,分别属于中国、印度和尼泊尔⁵,因此西部西藏的历史与考古、宗教与艺术的研究往往有多国学者的参与。

穹隆银城,象雄王国的都城,其具体位置到底在哪儿?一直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此次会议有多位学者分别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等不同角度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结论。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顿珠拉杰研究员梳理了本教文献中关于古象雄王国的都城——穹隆银城以及詹巴南喀石雕像等的相关记载,进而考察了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的卡尔董遗址⁶及其附近的修行洞和一尊粗陋的泥塑像,该泥塑像原为一尊非佛教的石雕像,应该就是象雄时期的詹巴南喀石雕像,卡尔董遗址则很有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穹隆银城所在。考古学家则对卡尔董遗址及其附近的古如甲墓地进行了实地的考古发掘和调查,结果与顿珠拉杰研究员的推断不谋而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李林辉副所长提交的论文就介绍了2012年他们在阿里噶尔县门士乡古如甲墓地和卡尔董遗址的考古新收获,也认为卡尔董遗址可能就是象雄国都城“穹隆银城”,古如甲墓地很有可能是象雄国贵族墓地,象雄王国的统治的核心地带应该就在象泉河的上游地区。除了上面提到的詹巴南喀石雕像,2004年在卡尔董遗址还出土有一尊双面铜像⁷,也是非佛教造像,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夏格旺堆副研究员通过这尊铜像突出的“相背的双面”、“屈膝弯手”等外观特征,并与印度教火神阿耆尼的形象作了比较,提出这尊像极有可能是印度教的一种火神形象。

关于吐蕃王室后裔阿里王系的传承,各种史书的记载不尽相同,错综难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早年曾经撰文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⁸,此次会议张云研究员发表了该文的续篇,分别从赞普后裔王系的划分、文献记载的不同阿里王系和赞普后裔的事业及命运等几方面入手继续这一问题的探讨。阿里诸王中为佛教复兴立下汗马功劳的古格王拉喇嘛益西沃(947-1024?)被噶逻人所害、为佛法献身的故事,是从《红史》开始的藏史名著均津津乐道的题材,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黄博博士对这一虚构的故事的演绎过程进行了剖析,剥离出了这一故事中的反面主角——

5 [瑞士] U. 冯·施伦德尔著,赵晓丽译,熊文彬校:《西部西藏金铜佛像》,载王尧、王启龙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五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231。

6 关于该遗址的考古调查情况见霍巍:《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穹隆遗址的考古调查》,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编:《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20-34。

7 霍巍:《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穹隆遗址的考古调查》,2000:28,图11。

8 张云:《阿里王统分析——疑义辨析之一》,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编:《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55-61。

噶逻人由一个凶残的绑匪、贪财的强盗到后来的迫害佛教、残杀大德的外道的角色变化过程，而这一故事的原型是 12 世纪中叶噶逻人入侵阿里，杀死古格王扎西泽，这一事件给西藏造成的恐惧感后来沉淀下来演变成了藏史中益西沃的殉难故事。关于噶逻人的身份问题，上个世纪 50 年代，霍夫曼（H. Hoffmann）就将噶逻辨认为中亚的噶尔禄。伯戴克（L. Petech）又指出，噶逻这个名字首次出现于 9 世纪，从藏文史料的记载来看，噶逻是突厥来源的穆斯林⁹。黄博士从汉藏文史料出发进行了细致分析，也认为唐代藏文中的噶逻指的就是汉文史料中的噶尔禄人，后来在喀喇汗王朝时期伊斯兰化，成为穆斯林。

古格王益西沃于 996 年创建了王室寺院托林寺和塔波寺，其中托林寺位于今天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塔波寺位于今印度喜马拉雅邦斯比蒂河谷。1042 年，益西沃的侄孙绛曲沃又对塔波寺主殿进行了装饰修复，迄今仍保存有大量精美的壁画、题记和写本，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¹⁰。来自印度喜马拉雅邦大学历史系的拉克斯曼·塔库尔教授（Laxman S. Thakur）在塔波寺保存的写本中辨识出有 11 个《华严经》的写本，壁画题记的内容一部分可以在这些写本中找到，但是与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中收录的该经的版本略有差异，这些写本中的一些对应于《四十华严》。这些壁画题记和写本的年代远早于西藏大藏经的结集年代，可以算得上最早的藏文佛经文献，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西部西藏的早期佛教艺术受到明显克什米尔艺术风格的影响，在托林寺、塔波寺和聂拉康等 11 至 12 世纪的寺院和石窟壁画中均可看到。阿米·海勒博士（Amy Heller）在大会上展示的三幅唐卡绘画——一幅红色观音、一幅坐姿十一面观音曼荼罗和一幅神殿内的释迦牟尼坐像也表现出了与壁画类似的古格王国巅峰时期克什米尔艺术风格可移动绘画的典范样本，可以说是这种风格唐卡绘画的首次呈现，此前

9 Luciano Petech, "Western Tibet :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Deborah E. Klimburg-Salter edit., *Tabo, a lamp for the Kingdom, Early Indo-Tibetan Buddhist Art in the Western Himalaya*,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98 : 249-250. 汉译文见 [意]伯戴克著、张长虹译：《西部西藏的历史》，《藏学学刊》第 8 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 165-166。

10 各国学者对该寺的壁画、题记和写本等进行了众多研究，对该寺壁画最全面的研究见 Deborah E. Klimburg-Salter edit., *Tabo, a lamp for the Kingdom, Early Indo-Tibetan Buddhist Art in the Western Himalaya*,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98. 对该寺题记的集中收录和公布见 Luciano Petech and Christian Luczanits, *Inscriptions from the Tabo Main Temple, Texts and Translations*,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LXXXIII, Roma: 1999. 关于塔波寺的写本和题记研究的有 C. A. Scherrer-Schaub and E. Steinkellner, *Tabo Studies II, Manuscripts, Texts, Inscriptions, and the Arts*,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LXXXVII, Istituto Italiano per L' Africa e L' Oriente, Roma: 1999 等等。

只有壁画和写本插图。唐卡画中的题材也在壁画中多有发现，尤其是金刚界曼荼罗这一题材，是西部西藏地区 11 至 12 世纪非常常见的题材，这应该与王室轨范师大译师仁钦桑布（958—1055 年）和克什米尔大师对相关佛经的翻译有关。

四、藏传佛教文献与宗教研究

从文献学入手进行佛教哲学思想或历史的研究是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传统，尤以德—奥学界的“史语方法”，亦即文献与哲学的双轨研究最具影响，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亦多受其影响。日本筑波大学的吉水千鹤子教授（Yoshimizu Chizuko）提交的论文《早期藏文注疏〈中论颂〉的章节标题和分类》即是一例。吉水千鹤子教授比较分析了巴曹·尼玛扎及其弟子香·汤萨巴·迥乃益希和玛恰·绛曲尊珠等人在《中论颂》注疏中所采用的不同标题，不同的章节分组，试着追溯《中论颂》在西藏中观论派学者圈的传播过程。德—奥学派量论研究的青年代表学者帕斯卡尔·于贡（Pascale Hugon）提交的论文《俄·洛丹协饶〈正理滴广注简明导论〉中西藏认识论分类的早期发展追踪》就最近在中国出版的《噶当全集》中发现的一部小文《正理滴广注简明导论》进行了讨论，该部著作作者为俄译师·洛丹协饶，他曾经在克什米尔学习十八年，精通梵文，能够直接阅读和翻译印度的原典著作，因此作者认为他相对于后弘期主要基于前辈学者的翻译而学习的学者而言，他是西藏的第一代认识论学者。他所著的《简明导论》更像是一部指导学生的教学用书，旨在向学生介绍《正理滴广注》的内容，但是他在解释文本时所用的新的分类和新的术语则更多的是他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因此尽管该部著作在西藏的认识论传统中算不上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但是它使人们得以窥见真正的西藏认识论体系的发端，紧接着作者又以其中五非量的分类作了一个个案研究，表明尽管西藏的认识论传统源于印度传统，但是西藏的思想家发展了他们自己对于认识论体系的理解和阐释，包括概念、分类和术语等，而这些在现存的印度作品中其实并没有相应的存在，是西藏学者的创新。

《吉祥喜金刚本续》是密乘佛教无上瑜伽部母续两部最主要的续典之一，其汉译本现存有三：一是收录汉本《大正藏》中的宋代法护翻译的《佛说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经》，即是《吉祥喜金刚本续》；二是在辽宁省图书馆找到的罗振玉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其抢救的清内阁大库档案中检出的《喜乐金刚空行母网禁略集大密本续》，这可能是元代或元代以前西夏时期翻译的《吉祥喜金刚本续》的汉译本残卷；

三是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藏品中发现的可能译自明代的《吉祥喜金刚本续王后分注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沈卫荣教授对这三种不同时代的、根据同一种原本的三种不同译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就其中的一些段落据梵文本和藏译本进行了对勘评估，发现宋代法护的译本内容支离破碎、多有增删和篡改，且晦涩难懂、文理不通，这也许是无上瑜伽部密教未能在宋代中国流传开来的原因。后两种译本则相对比较忠于原文，不失为优秀之作，或许为西夏、元代中国西北地区，密乘佛教在汉、西夏和回鹘等不同民族间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¹¹。

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刘国威博士发表了题为《噶举派大印 (Mahāmūdra) 禅修传统中关于“俱生和合” (lhan cig skyes sbyor) 来源的研究》的演讲，他认为“俱生和合”一词在藏文中的出现是源自岗波巴，其后历代噶举派祖师进行了阐扬，形成各类不同的大印教授。但是岗波巴就学于米拉日巴之前是噶当派僧人，因此他的见地不完全是来自噶举派的传承，在现存阿底峡的著作中，发现有两部与“俱生和合”相关的著作——《大印俱生和合一撰甲之口诀》(ལྷན་ཅིག་སྐྱེས་སྐྱེར་གྱི་ཆ་གཉིས་པའི་མན་ངག) 和《俱生和合教诫总集精要》(ལྷན་ཅིག་སྐྱེས་སྐྱེར་གྱི་གདམ་ངག་མདོར་བསྟུན་སྒྲིབ་པོ)，刘博士籍由这两部文献讨论了“俱生和合”在噶举派的起源和发展。哈佛大学博士刘翠兰提交的论文《〈噶当文集〉中十一至十五世纪的戒律文献研究》介绍了活跃于西藏 11 至 15 世纪的戒律文献的作者以及卫藏地区的六大古寺：桑浦内邬托寺、热堆寺、蔡公塘寺、噶东寺、觉摩隆寺和苏浦寺，尤其其中的桑浦寺和苏浦寺是卫藏地区下部戒律传承的重要中心。

近年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公布，大量的西夏文藏传佛教经典得以面世，对于研究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重构 11 至 14 世纪西域佛教史具有重要意义¹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聂鸿音研究员和孙伯君研究员提交的论文就分别研究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两部藏传佛教西夏文译本《等持集品》和《中有身要门》。西夏文译本《等持集品》译自藏文的 ཉིང་ངེ་འཛིན་གྱི་ཚགས་གྱི་ལེན། 款题绛曲桑波 (བྱང་ཆུབ་བཟང་པོ) 集，西夏仁宗皇帝御译。仁宗皇帝 (1139—1193 年) 的称号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其中少了 1141 年

11 沈卫荣教授该文《宋、西夏和明三种汉译〈吉祥喜金刚本续〉的比较研究》已发表于其主编的《汉藏佛学研究：文本、人物、图像和历史》一书中，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142—174。

12 关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重要价值，见沈卫荣：《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历史研究》2006 (5)：23—34。

获得的称号中的“制义去邪”几个字，因此推断其翻译年代是在1140年。卷尾另有一则草书的西夏文译经题记，提到“西天大师毗奈耶旃陀啰共译师西蕃比丘法慧等译，其后番国永平皇帝朝、大师傅兴盛正法寺内知译经诂义法门事度解三藏功德司正国师思善觉嵬名德源番译”。作者认为藏文译者毗奈耶旃陀啰为律月（Vinayacandra）、法慧是却吉喜饶（ཚཱ་གྱི་ཤེས་རབ་），永平皇帝朝是崇宗时期（1086—1139年），此外还对嵬名德源的一系列名号进行了考订。由此可见，该经经过了两次翻译，最终译成时间不迟于1140年。孙伯君研究员对同名的西夏文本和汉文本《中有身要门》进行了对勘译释，发现两者内容相近，但并非出自同一原本，且文体迥异，因此已经整理刊布的黑水城西夏文本目录和同名的汉文本，其内容并非完全能够勘同，这可能表明西夏时期传承的萨迦派、噶举派教法或许与元代的有所不同。

五、西夏、元明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与西藏艺术史研究

自西夏、蒙元时期起，藏传佛教拉开了东渐的大幕，也拉开了汉藏文化艺术空前规模交流的序幕。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的谢继胜教授的演讲《西夏元时期四臂观音图像的兴起与“六字真言”的流布》，以四臂观音图像和六字真言流布的个案研究，勾画出了11至14世纪前后藏、汉、回鹘、西夏、蒙古等多民族政治文化交流的轨迹，印证了元明以来多民族文化的趋同特征。自11世纪起，四臂观音的图像发现于从新疆到阿里，从河西到杭州的广大地区，并进而影响到卫藏夏鲁寺以四臂观音为信仰中心的图像体系。尽管8世纪末的藏文本《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记载要获得六字大明咒法力，必须进入四臂观音曼荼罗坛场，但14世纪以前的四臂观音似乎与六字真言没有关系。自14世纪以后，六字真言专指或等同于四臂观音，但脱离了与之相连的四臂观音图像而以密咒真言的形式成为藏传佛教的象征，遍布各地，并借助转轮藏演变而来的转经筒流布至藏传佛教传播的广大地区。马晓林博士的《真武—大黑天故事文本流传考——兼论大黑天始传蒙元的时间》一文分析了真武—大黑天故事在南宋和元代的不同版本以及元代的汉、藏版本，探讨了各版本故事的形成背景，认为大黑天于1240年代就已经在蒙古军中传播，并且是借由西夏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人中的，早于八思巴入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廖晞研究员则研究了北京智化寺所藏明代《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刊本中的炽盛光佛及诸星宿图像，经首扉画的炽盛光佛巡行图主要属于唐以来汉地传承的密法体系，卷后附的十一曜图像则主要遵从印藏的图像志描绘，

但是参考了汉传图像和星学，是汉藏文化传统交流融合的一个生动个案。

日本学者根本裕史（Nemoto Hiroshi）则探讨了西藏的弥勒信仰，在中国汉传佛教和朝鲜佛教中，弥勒信仰的基本观念有两种：信仰者升入兜率天宫得见弥勒菩萨和弥勒佛作为未来佛降世，前者可理解为与净土信仰有关，后者可解释为一种救世主信仰或太平盛世信仰。而在西藏，弥勒神话获得了新的意义，系由宗喀巴（1357—1419年）提出，并由以绛央协巴·阿旺尊追（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ཞུག་པ་དག་དབང་བཙུན་འགྲུག། 1648—1721年）为代表的格鲁派学者予以发展，即弥勒在过去已经成佛，不是未来佛，居住在兜率天宫的弥勒菩萨是佛的化身，为众生利益，佛可以化现为各种身相。将弥勒看作佛进行信仰所积功德要远大于将其看成菩萨，因为菩萨只是弥勒的一个化现而已，并且这种信仰与净土信仰和救世信仰无关，而与传统大乘佛教中佛性永恒遍在的思想有关。这种思想在西藏也被应用来解释菩萨和喇嘛的关系，桑结嘉措对观音地位及其与五世达赖喇嘛的关系的解释即是一例。

故宫博物院张雅静博士的演讲则探讨了学界关注较少的八大尸林。尸林本非清净之所，但能使发心修行之人通过尸林中的种种实践而得解脱，随着密教的出现和兴盛，尸林不仅成为重要的修行场所，还是各种法物的来源地，进而在内容上，出现了八树、八云、八护方等较为固定的程式；在图像上位于曼荼罗等密教图像外圈八方的装点和守护；在教义上，成为清净八识的象征，八大尸林也因此成为后期密教重要的组成部分。

六、藏文历史文献研究与明清以后的西藏

近年来，大批典藏的藏文文献被发现、整理和出版，引起了国内外藏学界的瞩目，前述多位学者引用的《噶当全集》即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大量的藏文史籍，这些均成为藏族历史、宗教和文化史研究的最基本的可靠史料。西北民族大学的博士生米玛次仁介绍了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保存的一部藏文版《贡塘寺志》，并据此探讨了蔡巴与蒙古建立关系的开始、蔡巴万户建立的时间、数位蔡巴万户长在位的时间等问题。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次旦扎西教授则介绍了由奈巴班智达扎巴门兰洛追（གྲགས་པ་སྤོན་ལམ་སྤོན་གྲོས།）所著成书于1283年的重要史学名著《奈巴教法史》及其重要的史学价值。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道伟·才让加研究员介绍了该馆功德林全宗档案收藏的蒙古和硕特汗廷缔造者顾实汗于铁龙年（1641年）颁给达普寺的一份藏文和蒙古文对照铁券文书，并且才让加博士首次汉译了该文书的藏、蒙对照全

文并对其内容作了考释。

日本学者小林亮介博士 (Kobayashi Ryosuke) 提交的论文《金川战争后康区的土司制度》探讨了金川战争后乾隆皇帝对康区管理思路的变化, 构筑了由将军、总督组成的复合体制, 导入年班制度, 以此筑固对西南诸土司的管辖。

西南民族大学的尼玛扎西博士则利用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收集到的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沃尔辛 (F. R. Wulsin) 于 1923 年在中国西北内陆的探险考察记录, 来观察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纷繁杂的历史事件及社会风貌, 如当时蒙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交融, 拉卜楞地区回族军事势力与藏传佛教中心等多元政治力量相互依存、多元文化丛生的状态, 并由此来重新思考中国近现代时期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势力和边疆族群文化间的互动。

小 结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里, 由于代表们发言时间充分, 配之以专业的同声传译, 中外学者得以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交流, 可以说是达到了本次会议搭建中外学者学术交流平台的目。通过此次会议, 我们也观察到有如下几点新的学术气象引人注目:

第一, 中外学者展示出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学术优势。国外学者的论文多从藏、汉、梵文本的对勘、译注和诠释或藏文文本本身的分析入手, 彰显了国际藏学界、佛学界仍然以语文学和文献学为主流的学术传统。中国学者则因地缘优势, 具有获取实地考察资料和档案资料之便利, 研究多从实地调查的考古资料或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着手, 因此每每有新的发现、新的研究引起学界的瞩目。

第二, 跨学科的交流与整合。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来自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宗教哲学、文献学乃至人类学等各个学科, 有些问题单从一个学科的角度难以进行全面的、深入的解读, 如果有多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着手, 进行整合研究, 则有望揭开或接近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如考古学家和藏学家对象雄古都穹隆银城的探查, 藏学家和西夏学家共同参与对黑水城藏传佛教文献的解读, 从事文献研究的学者参与对艺术史的考察等等, 都是很好的尝试。

第三, 多语言的研究方法。从事西藏历史、宗教或艺术的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种门槛相对较高的学问, 主要表现之一在于对语言能力的要求较高, 因为西藏文化的主脉是藏传佛教文化, 而西藏的佛教是从印度和汉地两个途径传入的, 后来又传到了回鹘、西夏人生活的地区, 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明朝和满人建立的清朝则

更是受到重视。外国学者由于悠久强势的印藏佛教研究传统，因此大多可以梵、藏兼通，精通汉文者亦不乏其人。我国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具备多种语言的能力的中青年学者，如兼通汉藏的西夏学家，精通汉文、蒙古文的藏学家等，大会的多位中青年学者可以不需要翻译进行双语发言，这是一个令人可喜的现象。

总之，此次会议充分展现了中外学者在藏学不同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次互动与交流的机会，从中我们也看到跨学科、多语言的研究方法正日益成为藏学研究的新趋向，若我们能够扬长补短，充分利用我们地利和汉、藏母语和文献的优势，借鉴其他学科和西方学术传统长期积淀之长项，弥补外文和少数民族语文能力欠缺之短项，那么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有国际话语权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